

那十年

——回忆赫鲁晓夫当政的十年

〔苏〕阿列克谢·阿朱别伊 著





2 015 9065 2

那十年

——回忆赫鲁晓夫当政的十年

〔苏〕阿列克谢·阿朱别伊 著

苏群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Алжубей

ТЕ ДЕСЯДЬ ЛЕТ

(根据苏联《真理报》出版社的《旗帜》

杂志 1988 年第 6 期和第 7 期翻译出版)

那 十 年

——回忆赫鲁晓夫当政的十年

[苏]阿列克谢·阿朱别伊 著

苏 群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375 印张 插页 2 张 146,000 字

1989 年 2 月第 1 版 1989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 册

ISBN7—5011—0342—9/D·58 定价:2.40 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赫鲁晓夫是怎样一个人，他在当政那十年做了些什么？尽管时过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是人们仍想对这个历史上名噪一时的人物有个更真实的了解。

这里，我们奉献给各位的是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写的回忆录，它对读者从一个侧面来了解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或许会有所裨益。作者不仅是赫鲁晓夫的亲属，在“那十年”里，他也是苏联新闻界的风云人物。他可以就近了解赫鲁晓夫本人，也可以因工作之便获得更多政界高层的情况。

阿朱别伊生于1924年，1952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1957年任《共青团真理报》总编辑，1959年任《消息报》总编辑。1964年10月因赫鲁晓夫被黜而离开《消息报》，到《苏联》画报编辑部工作，至今。

在《那十年》中，作者从其切身经历叙述了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的那十年里这个国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并

对其所奉行的内外政策的得与失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与此同时，阿朱别伊还以相当的笔墨描述了赫鲁晓夫家庭成员的关系、生活经历和生活方式，刻画了赫鲁晓夫本人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以及他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等等。

读者从书中可以了解到赫鲁晓夫的上台与下台、他出访美国、同卡斯特罗的会晤，以及他的“秘密报告”、“皮鞋外交”、回忆录的出版等许多重大事件的鲜为人知的内情。

作者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为赫鲁晓夫被非议的事情辩解，认为赫鲁晓夫是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人物，他的工作“不是徒劳的”，称赞他给国家留下的事情比他接管这个国家时“更加井井有条”。但是，作者也不回避赫鲁晓夫的失误和他的弱点。书中批评赫鲁晓夫的“不彻底性”阻碍了苏联经济、社会和精神领域问题的解决，政策缺乏整体构想等。

作为新闻工作者，阿朱别伊还用相当的篇幅揭示了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报纸的处境和作为。

译者

1988年9月

我和妻子在我的一位挚友家里迎来了新的一年，1966年。他们家的窗户面向伏龙芝滨河大街，凭窗眺望，白雪皑皑的河道、高尔基文化公园冰封的林荫小径尽收眼底，几个滑冰人的身影沿着小径晃动。一串串五彩缤纷的小灯泡闪闪烁烁，“鬼怪走马灯”发出一团一团的光……缤纷的色彩和灯光装点着这座与城市气氛不协调的黑暗的名园。亮光与黑暗就象童话中的善与恶一样，完全符合我们等待自鸣钟敲响十二下的心情。

黑糊糊的火车粗声粗气地嘶叫着穿过奥科鲁斯内桥远去。我一向同情节日期间上班工作的人们。而报纸工作者在这种节日经常是要值班的。那天晚上，《消息报》的同事拿着大样去找别的总编签发稿件去了，在这个节日的夜晚我是自由自在了。

差不多快天亮时，来了几位迟到的客人——一位著名的演员携着妻子，还有一位高级军官。妇女们在数他肩章上的星，在男人的帮助下，她们才弄清楚，这是一位上将。

“我们同将军虽然刚刚认识，但这已经算是去年的事了，因为是在克里姆林宫新年招待会上认识的。请多关照。”

演员介绍了这位军人的名字和父称，看样子，他也就只知道这点情况。

应当夸奖这位接受“通宵游玩”建议的将军。他来到一个陌生人的家，并没有使他感到拘谨。在新年里，所有的人都显得善良、聪明，都好象朋友似的。看来，客人都喜欢上这间屋子的主人了，欣赏主人那颀长的身材，亲切的低音，以及在餐桌上盛情招待客人的本领。这一切使已经疲惫不堪的客人的精神和热情又振奋了起来，犹如一个有经验的烧火工照着炉火，别让它灭了……

在生活中有过多少这样的夜晚，在那些意味深长的交谈中倾吐了多少真情！那种交谈是漫无目的的，偶尔也流露出一些不大现实的愿望，这些愿望在生活的重压下很快都化为泡影！而我们仍然谈个没完没了，一直停不下来，就象契诃夫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虽然我们也知道，语言的瀑布和尼亚加拉的瀑布不是一回事。

假如没有那位将军，难能忘却的新年“夜话”恐怕早已从记忆中消失了。我没注意，这位将军同主人什么时候开始高声争论起来。根据断断续续地话语听得出，他们是在谈赫鲁晓夫被撤掉的事和以后随之而来的情况。

“我告诉你，这是我国历史上白白浪费掉的、可诅咒的10年，你快点把它忘了吧，不然，你就要去请求宽恕了，而人们却不会信任你！”——将军几乎嚷着说道。

主人反驳了客人，客人生气了，开始扣衣服扣子，拍了一下演员的肩膀，说：“咱们走吧！真叫人扫兴……”

演员好象在打瞌睡。他用细嫩的手掌捂住两眼，但是，我看到，他的颧骨在抽搐。我了解他，他是一个火爆性子的人，我们一起在艺术剧院戏剧学校学习过，我知道，现在他就要发火了，一发起火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说来令我惊讶，他十分平静，站起来彬彬有礼地说道：“将军，我认为，这10年是伟大的10年。我和您在评价上有分歧。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您为什么连我们的主人都不允许有自己的观点呢……”

我们生活中那几乎被遗忘了的10年——1954年至1964年，是什么样的10年呢？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劳动与生活的10年中，在无数次各种冲突与碰撞下，千百万人的命运是怎样的呢？为什么有人以惊人的顽固态度要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这10年呢？好象这10年有什么罪过似的。不可能根据一两个哪怕是最全能的人的意志，就把人物和事实、数字和对比从书里和影片里抹掉。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名字保持沉默的数法不仅搞得很彻底，而且我要说是充满恶意的。一些天真的人曾经认为，这种沉默的根据是，对赫鲁晓夫的党务活动与国务活动作出的消极评价。但是，主要原因在另一点上。赫鲁晓夫曾敢于触动过的那个行政官僚制度“一点都没有宽恕”他。正是这个行政官僚制度以独特的形式“显示了它的力量”，并且警告未来：“不要碰我们！”

任何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都无法得出对那些不太平静、不太寻常的岁月没有争议的评价。不是用黑色就是用粉红色

来描绘那10年以及我们整个70年的历史，这种愿望本身就是荒谬的。

理智思考的时刻即将到来，所有头脑健全的人都要求把人民的历史还给人民。若是再不理睬这种发自内心的愿望，那就是罪过了。在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事件的知情人和参与者等许多人的努力下，这一时刻必将到来。在这个自我意识过程中，我们希望“赫鲁晓夫当政的10年”将得到客观分析和评价。

忘记过去是危险的。我们明白，“忘记”和“停滞”是一类词。这两个词背后的东西是能够打破的，而且必须打破。没有炽烈的情，没有损失和痛苦，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然而也会有所收获。今天，欢乐与不安同在，党的二十大以后那些早已过去的年代也是欢乐与不安同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是同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朋友都没有改变观点。他们当中有纳捷拉·格奥尔基耶夫娜·洛尔德基帕尼泽和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萨任。我知道，奥列格·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列莫夫仍然忠于青年时代的那些日子，他就是那个从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把那位凑热闹一闹的将军带到纳捷拉和维克托家里来的演员。

我们的朋友仍然住在伏龙芝滨河大街。他们的女儿娜塔莎已经长大成人，结了婚，我们的三个儿子也都长成小伙子了。在那个新年之夜，他们安静地睡觉了，没有看到大人的争论。他们常常问，很久以前和不久以前国内发生过什么事和怎样发生的。我们应当向他们讲述这些事情。

回首往事，我并不责怪自己没有做详细的笔记和写详细的日记。这不是一部披露耸人听闻的内幕细节的回忆录。这是一个记者的笔记，他先是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而后在《消息报》工作多年，长期以来，有关那些年的事情是不允许写出来的。

我的“日记”就是脑子里记住的事情以及报纸和杂志的合订本。其中大量反映了我的观点和兴趣。假如认为，我能避免主观评价，那就太天真了，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努力以事实为依据。

波列伏依曾教导《共青团真理报》年轻的记者说：“事实应当渗入报纸工作者的血肉，就象矿粉渗入矿工的血肉一样。”波列伏依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次选举时，派我去采访列宁格勒的一位工人代表候选人。我来到列宁格勒，同这位候选人长时间深入地谈过。在他家里同他一起喝过茶，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共青团真理报》发表这篇特写后，我给他寄去一份签了名的报纸。后来收到如下回信：‘记者同志，您一切都描写的很对，但只是为什么您要叫我去照镜子梳头呢。难道您没发现，我是秃头吗？’”波列伏依十分感慨地说：“我的兄弟们，不要把梳子变成我们这一行挖战壕的工具。”

我认为重要的是还要遵守另一条规则。不能用我们今天看待事物的尺度去衡量过去的事，忘记了事件是发生在彼时彼地，而不是发生在此时此地。“啊，如果……”之类幻想式的叹息，是最没有意义的了。我们中间许多人曾感觉到，二

十大的爆炸力在减弱，原地踏步必然会导致倒退，而且我们本来是能够猜出其原因的。我们看到了一整条相互依赖的链条。我们是不是要责备自己，也就是责备我们这些坚定拥护二十大事业的人，或是诚实地说，没有足够的力量坚持自己的观点？是不是要以追求舒适生活的恶习为借口来推卸某些责任呢？也许是想把一切都记在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账上？这样做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之所以最简单，是因为每个人听到这种话都可以意味深长地耸耸肩膀表示不理解。

我们要谨防这一套做法。如今公开性不仅急剧地提高了言论的价值和责任，而且大大地增加了言论的数量。此时，那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遭受重大损失的人，在宣传真理上，往往来得又容易、又快，真是可叹啊！

我对我的儿子们说：是啊，我们错了。我们错了，因为我们是一盘做沙，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性，没能象伪善团结的官僚阶层那样去行动。我经常对我的儿子们提起一句名言：“不要责备那些没来得及或没能做某件事情的人，不要妨碍那些正在完成工作的人，主要的是，要抓紧做你自己应当做的事。”

1987年春，在纪念《消息报》创刊70周年这一天，我应邀参加了庆祝大会，而且还在大会主席团的位子上就座。经过20年的间隔之后，这件事对我来说如同节日一般。那天晚上，我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同事们。在印数很多的那份《消息

报工作者》专刊上，刊登了这家报纸一些前工作人员写的短文，其中也有我的一篇文章。我这样写道：

“读者要到明天才能知道的事情，报纸的工作人员今天就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生活内容就是不断地事先预报某些事情，因此，他们生活的流逝也比所希望的要快得多。在《消息报》大庆的日子里，我想到了那些已经不在我们中间和值得我们衷心怀念的人们。我本想列举他们的名字，但突然打消这个念头，因为这份名单不仅会使人们心情沉重，而且名单也太长了。

“我在报社时并没有同亚历山大·鲍文一起工作，但我完全同他一样认为：无论他们，还是我们，而且不可能有第三者，都感受到当一名职业新闻工作者的幸福，而那些想暂且作后备队的人是不会有这种幸福感的。我这样讲是因为，大约30年前《消息报》工作人员所作的‘第一次尝试’，并不是毫无成果的。也许，有些东西使我们离开了原有的立场，但我们懂得，如果站在党的原则性立场、民主和公开性的立场上，如果我们没有把公务和服务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的话，我们的报纸能够做些什么，我们的职业的力量该有多大。

“怎么能不羡慕那些今天在《消息报》工作的人呢！既有冲锋陷阵的体验，也有不允许萎靡不振和行动迟缓的时刻。”

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倒退，有时是从不起眼的小事开始的。后来，当任何事情都不可改变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这

是一次漫长的退潮，就上帝容许的期限而言，人的整个一生对它来说也许还嫌不够。我国历史上是有这类例子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给斯大林专横行径的数千名无辜受害者恢复了名誉与尊严。但对于他们这些冤魂来说，已经是无所谓了。我们是否将遵守诺言为他们建立纪念碑，对他们来讲也同样是无所谓的。可是要知道，这种纪念碑我们却需要，为的是实现我们的意愿，确立我们的理想。而“违心地”去建纪念碑是危险的，这种纪念碑很容易从基座上倒塌下来。

就在《消息报》大庆纪念日的当天晚上，我熟识的一位文学家说：“我们还算走运。我们是在二十大后开始创作生涯的，我希望，我们在二十七天后将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我们都知道，一切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也有人抱怨说：很遗憾，“赫鲁晓夫的那一代人”尚未离开。他们总是幻想能有一个“强人”和有个“强有力的政权”，把它看作是避灾的灵丹妙药。不管怎样，这种想法并不新鲜。托洛茨基分子也曾说过，没有比民主更反动的东西了。那位凑热闹的将军也许由于考虑不周，也说过类似的话。

梅洛尔·斯图鲁阿也在《消息报》发行量很大的纪念专刊上发表了文章。在1959年，他是一位活跃的、象人们所说的富于幻想的记者。我是总编辑，他是文学编辑，我们俩相处得无拘无束，常常一起去印刷厂排字房更改令人厌恶的公式化标题。我们抓住一切机会摆脱那些单调乏味和千篇一律的东西，想方设法引起读者的兴趣。

有一次，梅洛尔受编辑部的紧急委托，在叶利谢耶夫商

店买了4公斤黑鱼子酱，连夜送往谢列梅捷沃机场，说服英国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把这些鱼子酱带到伦敦去。我曾打电话给卓别麟，请求将他撰写的《自传》中的某些章节交给我们首次发表，这鱼子酱就是他指名要的一种稿酬。该书马上就要出售了，一周之后，《星期日泰晤士报》打算刊登此书的片断。

他解释说，他要为这本书的出版举行盛大招待会，鱼子酱正好派用场。

当《消息报》驻英国记者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把一个大包裹(4公斤鱼子酱装在报社食堂的一口锅里，并塞满了从冰淇淋小贩那里弄来的冰块)送到旅馆时，卓别麟对他说：“真是疯了。这帮小伙子逼得我没有退路了。”接着便把手稿交给了他。

卓别麟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食言。

我们的这位记者一拿到手稿，便打电话回来，他一边翻译，一边口授，让女速记员记下书中的精采章节，直到《消息报》够一整版用为止。当天我们就使它见报了。读者们为这篇非同寻常的材料感到高兴，我们还专门说明了这篇材料是如何弄到的，我们也兴奋不已。我们赶在了西方报纸，特别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前头。问题在于，该报总编辑在此之前不久访问过《消息报》，他过于自负地试图在效率和灵活性方面教训我们。

当这位显贵的总编辑看到《消息报》上发表的卓别麟自传片断后，便鼓足勇气打电话给我们编辑部，请求允许他派一

名编辑来莫斯科实习。

顺便说一句，我们的会计也很高兴，因为这篇材料未花分文外汇。那时，即1960年，鱼子酱才22卢布一公斤。这是我们国内的价格。我们没有去查鱼子酱在英国值多少钱。大概要贵一些。

这一小段插话是要让人们更加明白，我为什么要援引梅洛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斯图鲁阿在《消息报工作者》专刊上所写的话。他写道：

“我回想起编辑部的一个不眠之夜。这件事发生在60年代初。总编辑在碰头会上谈了自己的不安心情。

“他说，‘二十大后，报纸是前进了一步。但时代在前进，我们却越来越经常地在空转，在原地踏步。让我们明天出完报后开个会，一起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全体人员都在应邀之列。我们对会议的时间将不作限制。如果需要，我们将一直讨论到次日凌晨。索尼娅将用茶点招待我们。’

“我们开始详细讨论如何迈出第二步。速记员来不及将我们提出的新的想法、标题和方案等等全记下来。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从白天开到晚上，从晚上又开到深夜。窗外露出了黎明的曙光。我们突然感到有一种隐隐的苦恼：我们提出的所有启发性建议，似乎与第二步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建议实质上不过是原地踏步而已。苦恼又变成极度的精神折磨。我忍不住发了言。

“我说，‘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我们这样熬夜是毫无意义的。只要党不迈出第二步，我们报纸就不可能迈出第二

步。

“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把目光移到总编辑身上。大家都等待着一场闪电雷鸣般的暴风雨的来临。但是，任何类似银河系中日珥的现象也未发生。

“阿朱别伊用一种低沉而疲惫的声音说，‘让我们散了吧，梅洛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的意见是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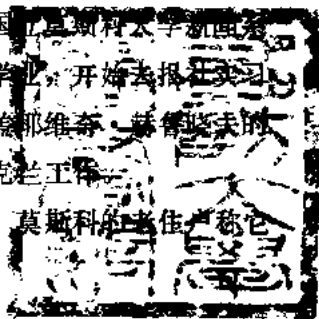
在1964年10月的那些日子里，我家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同妻子商定：不要在无谓的谈话中寻找谁是谁非，不要将委屈和荒唐事留在自己的记忆中。我清楚地记得，在拉达的父亲刚被免职之后，有一天她说：“你知道，这件事当然是令人难受的，不公道的，但也许能变成一件好事。”

“能变成好事”这一点使人产生这样的希望：从广义上和社会这个角度而言，生活将再次具有过去已失去的活力和连续性。不仅我们，而且许多人都希望，迈出“第二步”的时刻已经来到。

现在，事过近25年之后，由于多种原因，人们自然会回到所经历的往事。不了解情况就立即作出评判，这并不好。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将我本人和我的亲人了解的情况讲出来。那10年的事情当然是有其渊源的。

1949年即将结束。一个月之后，国立莫斯科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两名学生就要结束本学期的学业，开始去报社实习了。我和拉达在她父亲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莫斯科住宅里准备考试。那时他在乌克兰工作。

这幢房子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莫斯科的老住宅区。



为“苏维埃5号楼”，而从前是谢列梅捷夫伯爵的住宅。这幢房子是由建筑师亚历山大·迈斯纳按照19世纪末资产阶级的口味设计建造的。这幢外表粗糙的H字形建筑物门前有一座小花园，这与其用途完全相符：革命前，一些有钱人租用这里的房间。

在20年代至30年代，这里住过一些政府成员、著名的军事活动家和党的活动家。1938年，尼·谢·赫鲁晓夫也在这里得到了一套房间，他是从莫斯科河畔的那幢房子搬来的。那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派往乌克兰任中央第一书记。无论是从基辅，还是战时从前线来莫斯科出差时，他都住在这里。这套房间总是半空着，室内陈设在那些年里具有禁欲主义的风格——既没有地毯、玻璃柜、水晶吊灯，也不挂绘画和版画。台灯的形状象个大蘑菇；灯座是花岗石的，用青铜镶边的椭圆形灯罩是用毛玻璃制成的。

家具十分笨重，而且令人乏味，有床、桌子、椅子和亚麻布套的沙发、书柜、床头柜；看来这幢房子其他住家的陈设也是如此，这是当年不成文的标准。那时身居要职的人还不搞室内装饰，而且这一概念本身还未进入日常生活之中。

后来我才懂得，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风气。斯大林就是严格按照这种“衙门”风气生活的。他在南方、莫斯科和莫斯科近郊的住宅和别墅内的陈设，全都是这个样子。木制的地板、天花板和墙壁，家具少得不能再少，不挂任何绘画。家具是